

邓小平与中国外交“二十八字方针”

1989年到1991年,东欧剧变,苏联解体,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巨大挫折。在国际格局剧烈变化的关键时刻,邓小平高瞻远瞩,经过冷静的战略分析,提出了指导中国外交的“二十八字方针”,推动中国外交打开了新局面。

“二十八字方针”的形成

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,邓小平经过冷静的战略思考,邓小平提出了指导中国外交的关键原则。1989年9月4日,他在住地与中央领导同志谈话时指出:“对于国际局势,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:第一句话,冷静观察;第二句话,稳住阵脚;第三句话,沉着应付。不要急,也急不得。要冷静、冷静、再冷静,埋头实干,做好一件事,我们自己的事。”

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,邓小平关于中国外交如何应对变局的思想继续发展。1990年12月24日,他在与中央领导同志谈话时指出:“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。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当头,这是一个根本国策。这个头我们当不起,自己力量也不够。当了绝无好处,许多主动都掉了。”这就提出了“决不当头”的重要观点。但同时,邓小平也强调,中国“在国际问

题上无所作为不可能,还是要有作为”,中国有所作为的方式不是挑战西方阵营,而是要“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”。

经过对国际局势的观察和分析,在20世纪90年代初,邓小平就形成了指导中国外交的战略思想,即“冷静观察,稳住阵脚,沉着应付,韬光养晦,善于守拙,决不当头”,后来又增加了“有所作为”,统称“二十八字方针”。

为中国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

根据“二十八字方针”,中共中央明确提出,要继续执行改革开放以来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,坚持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,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世界上一切国家发展友好关系,为改革开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。

1990年7月11日,邓小平在会见加拿大前总理皮埃尔·特鲁多时说:“尽管东欧、苏联出了问题,尽管西方七国制裁我们,我们坚持一个方针:同苏联继续打交道,搞好关系;同美国继续打交道,搞好关系;同日本、欧洲国家也继续打交道,搞好关系。这一方针,一天都没有动摇过。”

为扭转局面、争取主动,党和政府确定了20世纪

90年代初期中国外交的两大重点:一是开展睦邻外交,稳定和改善同周边国家的关系,为中国创造良好的周边环境,同时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,为中国外交提供基础性支持力量,创造更加广阔的舞台;二是打破西方国家的制裁,恢复和稳定同西方国家的关系,为继续推进改革开放,引进西方的资金、技术和管理经验创造必要条件。

积极开展睦邻外交

20世纪90年代初,中国开展了有声有色的睦邻外交。面对苏联解体,邓小平强调,“不管苏联怎么变化,我们都要同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,包括政治关系,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”。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,苏联乱局没有影响到双边关系发展,中国外交实现了由中苏关系到中俄关系的平稳过渡。中国还抓住机会迅速与苏联解体后新出现的哈萨克斯坦、乌克兰等其他14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。

中国与其他周边国家改善或建立了外交关系。1990年8月8日,中国与印度尼西亚恢复了外交关系。1990年10月3日,中国与新加坡建立了外交关

系。1991年11月,中国与越南关系实现了正常化。1992年8月24日,中国与韩国建立了外交关系。中国还延续了1988年12月印度总理访华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发展势头,推动中印双边关系进一步发展。1990年、1991年中国与蒙古两国领导人的互访,实现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。此外,中国同世界其他地区一些重要国家的关系也取得突破,先后同沙特阿拉伯、以色列等建立了外交关系。到1992年8月底,同中国建交的国家达到154个,中国的“朋友圈”越来越大。

打破西方国家的制裁

中国领导人审时度势,采取政治和经济结合、官方和民间结合的方针,推动日本率先于1990年取消对华制裁。随后,其他一些西方国家和国际组织也相继取消对华制裁。经过艰苦努力,到1991年底,中国同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关系基本上回到正常轨道。

经过高超的外交运筹,从1989年到1991年,在西方国家制裁期间,中国对外贸易竟然逆势暴增,进出口总额从1117亿美元增长到1357亿美元。中国不仅顶住了压力,而且还顺势开启了一个全新的黄金增长时代。 李源正

张云逸组织山东军民支前

在共和国的大将中,张云逸属于“三高”:一是高资历,他不仅参加过同盟会,1926年加入共产党时已是国民革命军的师参谋长,衔至少将;二是高龄,他出生于1892年,授大将衔时已年届63岁;三是高薪,从国民革命军时少将薪饷,到共和国大将时,他拿着元帅级别的工资。之所以传奇不断,他虽不怕流血和杀头,且身经百战,却从未受过伤。

山东是张云逸战斗过的地方。抗日战争胜利后,中央军委决定新四军军部与山东军区合并,统一指挥山东和华中部队,陈毅为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,张云逸为新四军副军长兼山东军区副司令员,由于陈毅主要精力在前方指挥作战,军区的军事工作实际由张云逸主持。

为了做好自卫战争的准备,张云逸决定开展百日练兵运动。在随后的自卫战争中,不仅有力地配合了主力部队的作战,而且山东军区部队在胶济西段通过阻击和反击敌人,歼灭国民党军第73军、第96军等部近8000人。

在莱芜战役中,张云逸等领导的地方武装发挥了重要作用。他们以积极主动的行动向胶济线展开破袭战,一夜之间将坊子到兰村二百多里的铁路完全破坏。莱芜县委组织了10多万民兵,对铁路连续大破袭,完全切断了国民党军的交通,为主力部队迅速分割歼敌创造了条件。在作战中,各地组织的120个子弟兵团,村村布雷,日夜袭击国民党军。鲁中警卫第5团更在配合作战中,将敌第37师师长击毙。

在三年解放战争中,山东人民有700多万人参加了支前工作,将8.5亿斤粮食及大量的作战物资运送到前线。在整个淮海战役中,山东解放区平均每天运出粮食300万斤,在各解放区支援前线4.5亿斤粮食中,山东就占了2.3亿斤。淮海战役后,为了支援解放军渡江、解放南京、上海等,张云逸对于部队所缺物资,提出了清理仓库、加紧生产、尽力采购、厉行节约等办法加以解决,山东人民正是全力“推着小车”,极大地保障了解放战争。任振杰

宗城

任振杰

“学霸”徐光启造大炮

天命十一年(明朝天启六年,1626年)一月,努尔哈齐发起宁远之战,被明朝守将袁崇焕以红夷大炮击败,兵退盛京(今沈阳)。这场意义非凡的胜利让大明举国欢庆,袁崇焕一跃成为全民“偶像”。

但在这场胜利背后,有个关键人物被忽略了,他就是徐光启。徐光启是个怪人,靠八股文进入了明朝的官场,却取了个英文名——保禄(即保罗)。他撇开诗词歌赋,去研究农业、天文、数学等学科,还把自己的心得写成书,成了这些领域的专家。

明朝万历四十七年(1619年),努尔哈齐在萨尔浒(今辽宁省抚顺市大伙房水库附近)大败明朝数万精锐军队。面对严峻形势,徐光启用了3个月的时间对萨尔浒战斗的前因后果作了全方位的分析,写了一系列奏章,并提出选

练新兵、引进武器的主张。徐光启得到了朝廷赏识,被任命为军队的训练总监。

徐光启从来自西方的传教士口中得知西洋大炮的威力,据说射程能达到15里,炮弹所击之处,天崩地裂。他立刻给好友——在朝廷工部监理军需的李之藻写信,让他尽快购买这种神奇的大炮。

朝廷迅速集资,从葡萄牙人手中重金购得四门西洋大炮。在亲自见识到大炮的威力后,李之藻叹息道:“好是好,就是太贵了,关键是有钱还买不到。”徐光启说:“这也不难办,你奏请朝廷批准我们自己造!”徐光启从西方传教士那里要来西洋炮的制作图纸,与李之藻一同率领“研发团队”日夜钻研,竟真的造出一批大炮。这些大炮辅助袁崇焕击败了“常胜将军”努尔哈齐。 急脚大师

陈寅恪宁死不做日本人鹰犬

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,日军占领北平。日本人进城后,派人招揽当时的国学大家、陈寅恪之父陈三立,85岁的陈三立为表明立场绝食5日,不幸忧愤而死。

抗战爆发后,陈寅恪匆匆南渡,辗转于长沙、昆明等地,不久后接到英国牛津大学聘请,准备赴英国任教,不料赶上欧洲战事。陈寅恪等到1940年,依然不见战争消减的迹象。无奈之下,他滞留香港,接受许地山的邀请,出任香港大学客座教授兼中文系主任。

陈寅恪在香港生活困苦。据陈寅恪好友陈君葆在日记中回忆:“(1942年4月22日)刘孙二人昨携米十六斤罐头肉类七罐予陈寅恪,今日回来报告陈(寅恪)近况,谓他已挨饥两三天了,闻此为之黯然。”

1942年春,日本方面派人劝降陈寅恪。起初是日

伪组织派出的学生,随后汪精卫的夫人陈璧君也派人来陈寅恪家劝降,许诺他只要肯去广州、上海、南京等日占区大学任教职,就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。陈寅恪称病拒客,日伪组织持续上门,软的不行就来硬的,甚至暗示如果陈寅恪拒不服从,就会有生命危险!后来,就连陈寅恪在清华大学的同事兼朋友钱稻孙也过来劝降。但陈寅恪呛了他一鼻子灰,使钱稻孙尴尬不已。

陈寅恪还拒绝了日本驻香港总督及一帮文化汉奸,就算弟弟染病、自身抱恙,他也不收日伪一分一毫的贿赂。

1942年5月5日,乔装打扮的陈寅恪躲过日军监视,在夜幕下混进了一艘运粮的小商船,这艘船的目的地就是广州湾。几经辗转,1943年冬,他终于抵达成都,暂时任教于成都燕大。 宗城